

# 9.11 事件以來中、美、俄三國關係演進的背景及趨勢

## The Development of Post-Cold War Sino-Russian Relation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Развит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 отношениях по обе стороны Тайваньского Пролива

馮紹雷\* (Feng Shaolei ; Фэнг Шаолэй)

### 摘要

冷戰後大國關係的變化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中俄關係的發展對兩岸事務有著特殊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因此，研究中俄關係與兩岸事務的互動，對於加深理解當前態勢，推進祖國統一進程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次研討會的論文將涉及三個方面：

#### 第一、冷戰後大國關係的變化與中俄關係的發展

1. 冷戰後大國關係發展變化的基本態勢與走向
2. 新背景下的中、俄、美三邊關係
3. 中俄戰略伙伴關係在未來國際關係格局中的地位與影響

#### 第二、區域化進程中中俄關係的展開

1. 「上海合作組織」的形成與其未來發展
2. 中印俄三邊關係的未來前景
3. 亞太區域化進程中的「次區域」特色與優勢

#### 第三、中俄關係對兩岸事務的意義與影響

1. 中俄關係發展的進程表明了國際社會，冷戰後多極化推進的客觀趨勢，這一趨勢的形成為推進祖國統一提供了契機。
2. 中俄關係的發展為歐亞大陸內部的發展及其周邊地區發展創設了一個巨大的空間，這是兩岸人民加強合作與交流，共同努力創造未來的好機遇。
3. 中俄關係的發展表明了一個多種文明并存，多種社會經濟模式多種化發展的新時期的來臨，這又為兩岸人民為華夏文明自立於先進民族之林，帶來了新的前景。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

## Abstract

The change of relations between strong state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as enormous impact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had significanc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cross-strait affair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and cross-strait affairs i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moting unification. This paper will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sections:

1.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rong stat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a. The general trend of change of relations between strong states;
  - b.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 among Chin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 c. The status and impact of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and o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
2. The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cess:
  - a. The form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 b. The prospect for the relations among China, India and Russia; and
  - c. The feature and advantage of “sub-reg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cess;
3.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on cross-strait affairs:
  - a. the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illustrated the trend toward a multi-polar struc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trend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unification;
  - b. the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created enormous roo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asia continent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s. This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and to jointly create a great future.
  - c. the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made clear the arrival of a new era of pluralism in which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socio-economic systems co-exist and freely develop. This also provided a prospect for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become a part of the advanced world.

## Аннотация

Изменени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ержавами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оказывает огром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отношения по обе стороны Тайваньского Пролива. Развит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имеет уник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и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дела по обе стороны Тайваньского Пролива.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з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Тайванем позволяют нам глубже узнать нынешнюю обстановку а также имеет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процесса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я Китая. В данной работ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три аспекта:

**Во-первых:** Изменение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мире и развит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1. Изменения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иль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и тенденция в этой области.
2. О треугольнике Китай-Россия-США на фоне новой глобаль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3. Место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ческ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в архитектоник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его влияние н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Тайванем и Китаем.

**Во-вторых:** Развит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процессе интеграции регионов.

1.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Шанх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его развитие в будущем
2. Перспектива треугольника “Китай-Индия-Россия”
3. Черты и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субрегиона” в процессе регионализации АТР

**В-третьих:** зна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ческ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и его влияние на состояние дел по обе стороны Тайваньского Пролива

1. Процесс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оявляет объективную тенденцию к многогра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ю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данной тенденции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 процессе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Китая.
2. Развит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оздаёт огром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укрепления связей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Евразии и периферийными азиатскими регионами. Оно создаёт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е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усиле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обмена между народами двух сторон Тайваньского Пролива, а также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создания будущего.
3. Развит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оказывает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разных типов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и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овой эры, когда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развиваются многи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Это принесёт народам по обе стороны Тайваньского Пролива нов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 стать в ряду развитых наций.

9.11 事件的發生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慘劇，也是冷戰後國際關係格局變化，首先是大國關係變化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事件。因此，觀察冷戰之後，特別是最近以來的中俄關係的發展變化，不能脫離上述的大國關係變化，首先是中，美，俄之間相互關係的變化。

本文擬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展示本題。第一，鑒於 9.11 事件首先事關美國，同時因為美國無論從主,客觀上都在冷戰後國際關係中起關鍵作用，因此，先談談美國關於 9.11 事件後關於其對外政策的一些討論及其總體政策走向。第二，談談關於 9.11 事件之後，美俄關係的發展狀況。最後，從 9.11 前後大國關係變化的角度對中俄關係的發展現狀及其前景提供若干個人看法。

### 壹、9.11 事件之後美國關於對外政策的討論

根據筆者的觀察，9.11 事件後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討論，既可視為是對於 9.11 事件後整個形勢變化的新的認識，但也表現出 9.11 事件之前美國對於其外部世界認知的某種延續。

首先是，對 9.11 事件對整個國際關係及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究竟如何判斷，就有一些不同的認識。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曾預言，不光冷戰時期已經結束，甚至後冷戰時期也已經結束。言之下意，整個國際關係格局已發生根本性變化。但前國防部長施萊辛格則稱，認為 9.11 事件已經改變了一切，這是媒體上的習慣用語；事實上，9.11 事件只能是部分地改變冷戰後的國際社會和美國對外政策，而無法視之為全部發生變化，更無法使之脫離 9.11 之前的所有背景與積累。時下當紅的一份國際研究雜誌<< 國家利益>>的主編亞當·伽芬寇則總結了當前的兩種主要傾向。他認為，其一是認為 9.11 事件將把美國外交多年來的模糊與猶豫一掃而光，把美國從一個世紀以來集中於與歐洲法西斯和蘇聯為敵的狀態中擺脫出來，集中力量與新對手較量。其二則認為：9.11 事件是無任何先例的變化,所以，將為未來留下無可比擬的不確定因素。

總之，9.11 事件對美國人對於國際事務觀點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有人認為，這是珍珠港事件以來，甚至是自 19 世紀以來，美國首次在本土的核心部位遭到外敵攻擊。多少年來美國的安全優越感，美國的“不可被攻擊論”蕩然無存。其次是美國朝野第一次清晰地感覺到世界上竟有如此之多的人對美國不友好，甚至敢於以“自殺式的襲擊”來打擊美國，這對於一個總體上對外部資訊一向不十分在乎的國家來說，其震撼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再次，9.11 恐怖分子襲擊的是美國資本主義成就最突出的標誌與象徵——世貿中心大廈，這不光是美國的形象體現，而且是資本主義世界形象的集中體現，9.11 事件一發生，美國媒體評論就相當明確地意識到：“這是要打擊美國的靈魂”。雖然，不少人並不相信亨廷頓的“文明衝

突論，”但 9.11 事件發生不得不使人深思：資本主義文明究竟應該如何來調處它與世界其餘部分的相互關係。而作為一個民族成長、國家形成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幾乎在一個地方同時發生，其命運與前途與資本主義價值觀念息息相連的超級大國，首當其衝，不可避免地要對這樣的尖銳的、血腥的挑戰作出回答。

9.11 之後在美國外交界的這場討論與爭論，涉及到了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不光有關於外交決策，而且事關理論。其中，一個突出的傾向是現實主義強勁擡頭。就筆者之所涉獵範圍，我把這一流派討論中出現的主要觀點分別稱之為是“樂觀的現實主義”，“悲觀的現實主義”以及“歷史現實主義”。其實，美國對外關係中的“現實主義流派”與其觀點是否真正反映現實，並不一定有直接關係。這一派別與強調規範、道德、法律。與國際組織在國際社會中作用的“理想主義流派”不同，現實主義強調的是實力，乃至強權的作用。

先談所謂的“樂觀現實主義”。9.11 事件之後一個月不到，由《國家利益》雜誌發起，在華盛頓首都組織了一個名為“9.11 攻擊事件的影響”的研討論。會上，全國知名的專欄作家查爾斯.克勞瑟麥作了一個長篇講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爭論。查爾斯.克勞瑟麥的觀點大體有這樣幾個層次：首先，他直接了當地引用布希總統的話稱：9 月 11 日那天可視為是一個測量溫度的計量器，我們將以其他人對 9.11 攻擊事件的最初反應，以及對隨後開始的阿富汗戰爭的反應來判定他們對美國關係的親疏，以及來劃定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克蘇瑟麥認為，這是因為，9.11 攻擊事件反映的是國際關係中的一個“結構性變化”。這個“結構性變化”含意是指：恐怖主義力量取代法西斯和前蘇聯帝國成為美國外交原則的對抗者；雖然，美國獨立的單邊主義結構在過去十年中沒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戰，但是恐怖主義激進力量對美國的打擊使得美國“變弱了”；恐怖主義敵手所採取的非常規的武器與進攻技術，借助於狂熱的宗教情緒，甚至依靠了對死亡的崇拜，使得挑戰霸權出現了全新手段，使得國際關係中的結構關係具有了全新的含義。克勞瑟麥稱：新的國際關係結構中以美國為一方和以阿富汗塔裏班勢力為一方的相互關係是一種“不均衡關係”，雖然“美國正在變弱”，但是相對於被孤立、被封鎖的塔裏班而言，美國仍然擁有巨大的“剩餘力量”。因此，克勞瑟麥提出，為使美國不再“變弱”，“當務之急是有賴於清醒的理智和成功的反應”。何謂“成功的反應”，克勞瑟麥認為，那就是要把在單邊主義國際結構中獨大的美國所“剩餘的實力轉化成為明確的政治後果”。克勞瑟麥為論證其“剩餘實力轉化論”提出了一連串證據論：

其一，他稱，實力的顯示從來比“共同的規範、協定的制約，國際心理的改善”等因素來得重要；二戰以來的事實表明，如果不是美國顯示威力，不光世界會“面臨實難性後果”，而且“美國也會如同奧斯曼，哈布斯堡、包括前蘇聯諸帝國那樣分崩離析”。人們從這裏可以嗅出氛圍傳統現實主義理論的強烈氣息。

其二，克勞瑟麥認為，盟國以及潛在的盟友考量的就是美國的決心是否堅定：“如果半途而廢，我們何必與你在一起，如果你走到底，我們將跟著你”。因此，美國為了維護它所指它的聯盟必須顯示實力，而且必須表現成功。

其三，在克勞瑟麥看來，俄羅斯在 9.11 之後可能出現的與美國“重新結盟”的態勢是前所未有的重要迹象，這是國際關係發生結構性改變的一個重要開端。

最後，克勞瑟麥甚至動用心理分析來尋找根。他稱：9.11 所帶來的強烈震蕩又一次使美國人“改變了心理認知”，也即美國人習慣於在對外關係中使自己處於“人身安全的最大極限”，比如，越南戰爭。而 9.11 襲擊使“上帝保佑美國”的信條受到挑戰，又一次把美國國民推到“人身安全”的極限，這不光大大強化了對民族國家利益的心理認知，而且，由於美國在國際關係結構中的特殊地位往往使其心理認知超出自身民族國家利益的範圍，而呈現擴張性。

總之，克勞瑟麥以“顯示力量”，“結盟”和“轉化剩餘實力”為核心範疇展示了他對 9.11 國際關係變化的理解。他在發言總結中稱：“這樣會使我們的對外政策比許多人所願意看到的那樣更加朝向經典的現實主義。”筆者所冠“樂觀現實主義”之名即以克勞瑟麥的這種“自信”而來。

但是就在當天會上，克勞瑟麥的話音未落即遭到了到會者一連串問題的質疑。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戴維·蘭著頓提出：“在美國構建聯盟和對阿富汗進行戰爭的最終目標之間是否存在矛盾？”卡耐基基金會主席 J. 瑪瑟斯問道：“沒有人會反對成功。但什麼叫成功，怎樣才能成功，何時才實現成功，怎樣能夠度量呢？”。會議主持者前國防部部長施乘辛格則歸納道：“克勞瑟麥構想的核心是國際秩序有賴於美國“動真格”地顯示實力，但要確認何謂“動真格”，實在不容易”。<sup>1</sup>

9.11 事件後的美國對外關係討論中，不光傳統類型的“現實主義者們”表現得信心十足，同時，也有一些相當有影響的人物卻表現出了悲觀主義情懷，筆者稱之為“悲觀現實主義”，其代表人物是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熱津斯基。

布熱津斯基於 11 月初，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團結合作的新時代嗎？別指望那個”的文章。他針鋒相對地認為，9.11 事件之後一些所謂“現實主義力量”的最無稽之談，便是出現了“兩大幻象”：其一，是以為由於當前美國急需組成反對恐怖主義的廣泛聯盟，因而“將使在國際事務中美國主導的格局急速轉變成真正相互依存式的合作”，其二，是輕信 9.11 之後，俄羅斯作出歷史性的選擇，力爭成為美國領導下的西方的一部分，爾後再變成為美國的盟友。與

---

<sup>1</sup> “After September 11: A Conversation”，載於《The National Interest》2001 年 Special Issue 第 66—71 頁。

克勞瑟麥這樣的“樂觀現實主義者”相比，經驗老到，目光犀利的布熱津斯基更傾向採用當今國際變局中種種現實的態勢來論證自己的觀點。

布熱津斯基認為，儘管北約所有成員一致同意啓用“第五條款”，儘管俄羅斯率先，而後許多國家都向美國反恐怖的行動保持，儘管伊斯蘭國家會議譴責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義不相一致，特別是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決議，授權推動反恐怖主義的國際合作，但是，他認為進一步觀察之後便不得不對目前態勢“表示很大的悲觀”。用他的話來說，“團結合作是存在的，但是言辭多於行動。實際的權力配置並沒有被改變”。

布熱津斯基分門別類地指出了當前反恐怖運動中的問題。

先看歐洲。布氏尖銳地指出：美歐傳統合作中的一個被其重要的部分——歐洲，目前仍然是去向不明。當前與美國的反恐怖合作行動，並不是以整個歐洲，而只是以個別國家的身份參與。比如，英國直接參加了一些與美國的反恐怖合作行動，但是，布氏認為，英國同時可以達到的並不需要遮掩的一個明顯後果，便是可以以此影響美國的決策。大部分歐洲國家只是停留於在反恐怖合作中參與資訊交流與共同調查。布熱津斯基認為，即便如此，也是因為目前還有一些偽裝得很深的恐怖主義活動小組隱藏在歐洲，這成爲不少西歐國家自身的隱患。甚至，近來歐洲不少國家還開始對美國發動反恐怖戰爭的強度與範圍表示擔憂。

至於俄羅斯，布氏堅持認為：普京是在觀察美國是否真正原爲反恐怖聯盟付出實際的代價，對俄羅斯而言，這包括北約東擴、ABM 協定、外債的減免以及俄國內的車臣問題等各個領域。所以，布熱津斯基表示“普京是想要進入西方與之爲盟，還是利用這個機會，儘快向美索要讓步”還值得觀察。他特別提醒：普京最近向德國呼籲要與俄一起建立歐洲的強權，這樣的強權實際上是在擠壓美國。

布熱津斯基指出：簡而言之，在反恐怖的“團結合作”中(印號爲布氏所加)甚至還找不出對恐怖主義威脅的共同定義，而是各有各的說詞。他說“對印度人來說，恐怖主義威脅指的是在克什米爾的穆斯林；對俄羅斯人來說，指的是車臣人；對以色列人來說，是巴勒斯坦；而對阿拉伯人來說，則是以色列；對美國人來說，當然不是伊斯蘭教，但是在本·拉登這個撒旦式的電視形象背後，究意又是誰呢？”所以，在這樣的難題面前，布熱津斯基擔心以後的幾個月將是對美國真正的考驗，他尤其希望美國不要爲試圖穩定局勢，而花上幾年功夫糾纏在阿富汗事務之中。

作爲一個悲天憫人的“現實主義者”布熱津斯基的結論是：“向恐怖主義作鬥爭的底牌是重頭戲需由美國自己來承擔，也只有美國具有這樣的戰鬥能力從軍事上和政治上發起反恐怖的運動”；但是，他是悲觀地推測道：“這樣一種現實本身

也非常清晰地暗示了一個事實，雖然，美國現在可以主導一切，但是實際的出路將只會是走向全面的無政府狀態”。<sup>2</sup>

看來，布熱津斯基的悲觀判斷是給了“樂觀的現實主義者們”當頭一盆冷水。問題在於，9.11 之後的美國外交走向多大程度受類似理論的影響呢？核心決策層與這樣的一些所謂“現實主義理論”有何干系呢？

值得關注的一個人物便是美國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沃爾夫威爾茲。此任之前，他還曾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的院長。1997 年和 2000 年，沃氏曾先後發表初篇長文，以總結歷史經驗的方式，試圖為當代美國對外戰略指點迷津。鑒於他基於歷史分析來鋪陳他的現實主義理念，因此筆者把之歸入歷史的“現實主義者”一類。

沃文夫威文茨的借古喻今至少有兩個方面。其一是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部分起因，是因為“即定秩序捍衛者”的“民主英國”遭到了作為“現存秩序挑戰者”的“正在崛起的權威主義的德國發難”<sup>3</sup>。沃氏竟然以此比附當代的中美關係，直言中國是“現存秩序的挑戰者”<sup>4</sup>。此文既出，曾受到歐洲著名國際問題高等學府——日內瓦高級國際研究生院一位教授相蘭欣博士針鋒相對的回擊。相博士的論文批駁了沃氏對歷史和當代現實的誤讀：第一，當代中國根本不是當年德國；第二，當代現存秩序的和當代現實挑戰者恰恰是美國自己，而不是中國；第三，這位學者還運用史實在學術上證明世紀初英德關係中的挑戰者也恰恰就是英國，而並非德國。這場爭論曾在歐美學術界引起震動<sup>5</sup>。

其實，沃文夫威文茨關於冷戰教訓的總結也正好證明了他上述觀點的謬誤。他在上述兩篇長文中關於這方面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批評從 70 年代早期到中美建交，一直到克林頓總統美國在對華政策上的“錯誤”，主張對華政策的強硬態度。非常明顯，布希政府競選期間及而後一度強調中國為“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並且加大對臺灣軍售力度等等，與沃氏上述理念有直接的關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 9.11 事件之後一個多月，沃爾夫威文茨對《遠東經濟評論》所發表的一篇講話中則改變了調門。當他在談到中國未來發展後果時，明確

<sup>2</sup> “New Age of Solidarity? Don't Count on It”，Z. Brzezinski，《Washingtonpost》2001 年，11 月 2 日。

<sup>3</sup> Paul Wolfowitz “Bridging centuries-Fin de siecle All over Again” 《The National Interest》1997 年春季號第 7 頁。

<sup>4</sup> Paul Wolfowitz: “Remembering the Future” 《The National Interest》2000 年春季號，第 42 頁。

<sup>5</sup> Lanxin Xiang “Washington's Misguided China Policy” 《Survival》2001 年秋季號 第 7-23 頁。



地表示：“中國經濟增長越快，軍事就會越強大……軍事上強大了並不意味著軍事擴張”。尤其有意思的是，沃爾夫威文茨反而批評道：“歷史悲觀主義者說，一百多年前，德國與日本強大起來以後就是走的這條道路。我認為，歷史不一定非要重演。中國的經濟增長使它具有巨大的軍事潛力，但是經濟增長也使和平與中國利益息息相關。”這位“藍隊”中的著名強硬派核心人物為何會改玄更張呢？用他自己的話來回答，那就是反恐鬥爭“有助於中美兩國關係的加強。

雖然，“現實主義流派”遠不是美國對外關係指導性理念的全部，不過顯然對當今美國外交在某種程度上佔據主導性的影響。眼下無論“樂觀的”、“悲觀的”、還是所謂“歷史的現實主義流派”之間的種種爭論和政弦易轍，都體現出9.11之後美國朝野對於對外關係的一種新的解讀與體認，雖然上述種種說法的含義與背景，還都有待觀察，可能更談不上會馬上發生所謂從“單邊主義”向“多邊主義”的轉向，但畢竟有了一些值得思考的變化。

多年以來，特別是冷戰以後，美國對外戰略定位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在國際格局轉換期，一個新興的崛起中的大國必然會對原有的主導性大國發起挑戰。在這樣的思維定勢之下，“尋找敵人”就成為美國外交中的一個必然邏輯。試問，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在一個全新的國際環境之下，人們有沒有可能擺脫這樣的“敵我”邏輯，而去尋求新的和諧整體呢？9.11事件的血腥教訓理應給人們提供啓示。

## 貳、9.11之後俄美關係的新發展

歷史上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5年前，也即1986年年底，前蘇聯首腦戈巴契夫與前美國總統雷根的雷克雅來克會談，同樣是蘇聯新領導上臺一年半後的第一次與美國首腦正式會談；同樣是一個把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與戰略防禦體系掛鉤的一攬子談判；同樣是正式會談之前兩國輿論與媒體大肆炒作，造成可能達獲歷史性突破的很高預期，但最終在關鍵問題上卻未能達成共識。當時，是戈巴契夫提出了美蘇各自取消設置在歐洲的所有戰略核武器（所謂“零點方案”），僅在蘇聯的亞洲地區和美國各自設置100枚戰略核導彈，而以此迫使雷根撤銷當時俗稱為“星球大戰”計劃的戰略防禦體系。美蘇的實力差距和冷戰背景下高度對峙的戰略意圖與利益，使得雷克雅來克會談無果而終。筆者當年是在前蘇聯，而今是在華盛頓，親身體驗重大事變之下的當地氛圍，撫今思昔，不無論桑之感。

畢竟，15年後的今天已然不是當年冷戰時代。因此，這一次的俄美首腦會談自然有它值得令世人關注的一面。首先，美俄兩國首腦基本達成了大幅度削減各自戰略核武器的協定，這不光為兩國各自今後的戰略調整與發展留下空間：實力不支的俄羅斯早已不堪承受維持龐大核武庫的壓力，而美國旨在騰出手來，集中

精力於戰略防禦體系及其它方面的調整與拓展；對國際社會而言，一個危害人類的核武庫有可能得到裁減，相對而言，總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追求穩定與安寧的某種期待。

雖然俄美雙邊關係的進展遠不如首腦會談前輿論和媒體所預言，但是在戰略問題、反恐怖問題以及經濟關係問題上所達成的共識和所取得的氣氛改善還是比較明顯。

就戰略問題而言，美俄首腦都承認並未在最為關鍵的“反彈道導彈協定”問題上取得突破，也即並未為事先所一再猜測與流傳的那樣：美國同意形式上保留“反導條約”，而俄國事實上允許美國進行戰略防禦系統的試驗。但是，美國宣佈推遲進行擬議中的戰略防禦系統的試驗；並不是象今年春天所宣佈的那樣在2001年11月單方面退出“反導條約”，而是把這一期限至少推遲到明年春天；同時接受俄方提出的把削減進攻性武器與修改“反導條約”掛鉤，並同意單方面大幅度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這一系列立場在首腦會議上得到確認。而俄國方面，早在峰會之前，態度強硬的俄國防部長就公開表示：1972年“反導條約”“部分地是屬於冷戰遺物”，而普京在峰會中再三表明俄具有“靈活性”、俄與美之間在這一問題上方法儘管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這些表態為未來的談判留下了空間。

美俄峰會前夕，相當突出的變化是俄羅斯接近北約的積極態度。在首腦會談以及普京與美國各方精英人物的談話中，普京也不止一次假設性地提到了俄加入北約的可能性問題，普京認為，50年中期的前蘇聯政府就提出過加入北約的問題，他說：“我們準備與北約擴大合作，北約盟國能接受到什麼程度我們就準備推進到什麼程度”。雖然北約盟國對此表示“並未作好準備”，但布希還是明確表示了“北約與俄羅斯重新構建相互關係的建設性姿態”。

在反恐怖問題上美俄首腦達成關於“後塔裏班”阿富汗政府構成的共識，基本排除了塔裏班激進勢力參與新政府的可能性，有人驚呼：從中依稀可見二次大戰美英蘇三大國協商劃分戰後勢力範圍的影子。

至於俄羅斯寄于頗高期望的經濟合作問題，美國一方面謹慎地承諾“開始與國會磋商”有關撤銷1974年“傑克遜—瓦尼克法案”，以及給予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國的地位問題，從而為順應俄加入WTO的要求作一定的鋪設；同時推動“愛克森—莫比爾”公司在俄撒哈林油區作首期40億美元，二期130億美元的鉅額投資。

本次首腦會晤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相當突出美俄最高領導人的個人交往。以前，布希曾經表示過：他“面對面地從普京的眼神中能感受到他的靈魂”，不無

褒揚無意；而這一次普京在行前就對美國記者表示：“俄羅斯之所以在與前任美國總統在戰略問題上持強硬立場，就是因為準備與那些在今後四年，甚至八年都留在白宮的人打交道，這樣的人出現了，那就是布希”。在德州之行中，普京則投桃報李，稱：“布希是一個說到做到的人”。

總的說來，儘管美俄峰會並沒有達成預期的結果，即便是上述承諾與溝通遠需經過時間的考驗。包括直到 12 月上旬北約秘書長羅伯遜與俄首腦會晤，雖然北約方面提出了同意俄部分參與北約決策的建議，但俄加入北約問題仍未鬆口。但是，如何應對“9.11 慘劇之後的變局，作為前超級大國的美俄兩國，無論是當前還是將來都不僅指望對實際事務的進一步謀劃，而且也需要這樣一種相互間的籍慰，這就是美俄兩國關係可望發展的契機所在。

美俄關係能否取得進展，事實上還是受到以下一系列問題的制約。

首先，美俄兩國的政治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取得認同。9.11 事件之後，普京是第一個向美國表示聲援的外國元首，當時，俄羅斯居民自發地向空難者獻花哀悼，民意測驗中 85% 的居民表示了對恐怖主義的譴責。事實上，俄羅斯多年來苦於與車臣恐怖主義者、分離主義者的衝突、近來又屢遭炸樓、劫機、毀車等恐怖行徑的驚擾，包括受到來自塔裏班的對俄南部地區的巨大威脅，這些因素都促使了俄美在反恐怖主義問題上立場的接近。問題在於，因 9.11 事件而引發的同情與關切，是否能夠轉化為作為兩國成為盟友的政治文化基礎。根據普京訪美前夕俄居民的民意測驗，可以發現俄居民對俄美關係的速變仍有歧見：41% 贊成美國對阿富汗開戰，57% 反對；47% 認為俄應中立，41% 認為俄應支援美國。也許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以下這則民調材料：雖然普京近來越來越強調俄羅斯屬於歐洲文明體系，所以，“回歸歐洲”是當然之則，但 11 月 2—5 日的民調顯示，承認俄屬於西方文明類型的只有 13%，感到難以回答的是 17%，西方達 71% 的民意認為俄羅斯屬於特殊的歐亞型文明，或者東正教文明，並申明西方式的發展道路是走不通的。喬治城大學俄國研究中心主任安琪拉·斯坦因認為：如何在不久前科索沃戰爭中表現出來的俄國國民強烈反美的歐亞主義情結與當前迅速產生的親西方心態之間掌握平衡，對其領導人是一個考驗<sup>6</sup>。

其次的問題是 9.11 之後俄羅斯所給予美國的合作與支援是否理應得到回報，從無論俄美兩國當前辯論中也都明顯存在歧見。一派意見認為：9.11 事件中俄羅斯給予美國的支援甚於其西方盟國，並且這也是難得的推進雙邊關係的好機會，因此要盡可能地滿足俄羅斯方面提出的諸如幫助俄羅斯儘快加入 WTO、減免俄欠西方債務、大幅度推動對俄投資等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俄中間派力量的主要精

<sup>6</sup> Angela Stain's speech in SAIS of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2001.12.

英，如普裏馬科夫、盧金、羅高津、沃爾斯基等原來曾是主張對美較為強硬的人物，這次聯名致信普京，提出權衡利弊後，俄應迅速改善與美國關係，“以免被捲進那些落後、不滿、沒有希望以及主持激進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國家行列中去”。

但是俄政治家雅博盧聯盟的主席雅夫林斯基則堅決反對在此時向美國提出更多的要求。

最為關鍵的是美俄合作過程中如何確立一整套有序的制度安排問題仍然是比渲染氣氛、人員往來更為艱難的事情。這尤其突出地反映俄羅斯與北約關係，以及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與“反導條約”的掛鈎談判中。

以俄與北約的關係而論。首先，北約吸取新成員歷來有一整套所謂規範，其中包括民主化管理的程度、公民對軍事力量的監督、與鄰國的和平關係、國內少數民族的前途、可用於北約其他國家的武裝力量等等。俄羅斯是否符合這些條件，尤其是是否願意放放架子，象中東歐發地些小國那樣接受北約的審核都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其次，如果北約要擴及至俄羅斯，則其疆域要擴展到整個歐亞大陸，要面臨不可勝數的新的地緣政治問題，看來，北約本身根本還沒有這樣的心理乃至技術準備。最後，北約作為冷戰的最終遺產，其自身的合理性因對手的消失都成了問題。9.11 事件後北約的歐洲盟國抱怨美國，光顧及與中亞國家發展結盟關係，而無暇顧及歐洲盟國，似乎北約已經失去了效用；而事實上反對恐怖主義威脅，北約也的確面臨重新定位的問題。從更深層次看，面對冷戰後，包括 9.11 之後的國際新格局，早就有學者提出，北約應該是新型成為類型似於歐安會這樣規模的區域安全組織。到這個時候，與俄羅斯一再鼓吹的北約組織“政治化”真的是已經相距不遠了。此時的北約當然早已面目全非。

明年春天布希回訪莫斯科之時，也許是俄美關係的一個關鍵轉捩點，撲溯迷離的“反導條約”談判已無多拖延擱置的餘地。而布希與普京也應該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就戰後最為複雜的戰略問題的程式安排作出考慮與決定，不光使俄美兩國，也使整個國際社會真正有可能走出冷戰陰影。

### 參、9.11 事件之後中俄關係發展前景的若干判斷與思考

儘管 9.11 事件之後的國際事務撲溯迷離，但借助於歷史的慣性和理性的判斷，中俄關係的發展並非無徑可尋。

9.11 事件的發生雖然為俄美關係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發展相互關係的機會，但這對於中俄關係來說，依然是挑戰與機會兼具。就挑戰而言，顯示人們必

需擺脫“冷戰思維”定勢，拋棄“零和式”的搏弈規則，要以全新的視野與理念來思考中俄關係的定位與前景。中俄關係不可能簡單重復 70 年代初期中美蘇大三國關係的歷史，任何孤立地、割裂的方式看待三者關係顯然只會導致謬誤。具體地說來：俄美戰略關係的調整可能局部地使某些中俄之間曾經被沿用的立場轉化為新的形式，在大局上說，這不光是使整個國際局勢有可能進一步得到穩定，而且也可能為中國與俄羅斯和美國進一步發展關係提供機會。

客觀上說，存在著這樣的機會與條件。

首先，9.11 事件的發生有可能進一步促進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9.11 之後，上海合作組織的反恐怖機制由於剛剛在創設之中，並未過於侷促地對反恐怖事務作出全面的具體安排，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加緊磋商已經使反恐怖合作的格局有了新的發展。鑒於反恐怖事務的迫切性，上海合作組織完全可以在這一問題上得到發展的支撐。

進一步言之，上海合作組織是跨文明的，是歐亞大陸大國與小國之間的，也是轉型國家間的一個全新的區域合作組織，很可能亞太地區的合作會以東盟、或者上海合作組織這樣的形式，在次區域層面上得到突破和推進。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空間是中俄關係的重要基礎。

其次，今年 9 月，正值朱熔基總理訪問莫斯科期間，筆者在莫斯科，有幸親身體驗在朱總理親自大力推動之下，中俄雙方對發展經貿關係的決心和良好預期。9.11 事件的發生以及西方經濟的疲弱對於加強非西方國家間的經貿合作是一大契機。特別是中國西部開發的形勢也對中俄關係也帶來了極大的機會。隨著政府間的推動，中俄的經貿與科技關係可以預期會出現穩定的推進。

最後，中俄同屬轉型國家，兩國在從傳統體制向市場與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有大量可資交換的資訊與經驗。這是一個目前開發尚不充分，但大有空間的領域。

雖然中國與俄羅斯都不屬於發達國家的行列，從某種程度上說，兩國卻不屬於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明類型，這種狀況使得兩國會找到更多共同的語言和更多共同的感覺去迎接未來的挑戰。這也許是中俄兩國關係的一個更為深刻的背景。